

攜手不同心

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簡記

● 李白虹（前台灣新生報董事長）

（一）對日抗戰時期國共合作感懷

「八年戰血滅家園，

吳楚東南盡淚痕，

攜手已遲猶有恨，

恩仇敵友總難言。」

（二）戡亂戰後退保台灣

「百戰艱難遺恨在，

十年劫火換紅羊，

天留寶島期匡復，

一旅中興繼少康。」

俄共中共關係匪淺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月中共被

國軍追剿途中——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三天（六日至八日）檢討蘇區軍事失敗的責

任。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猛烈批評俄共派駐

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認為：「分兵把口，

短促突擊，單純防禦的戰略戰術」是最大的

錯誤，斷送了整個蘇區。接著劉少奇也為「

白區」工作問題，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

；秦邦憲（博古）則為中共中央總路線的正

確作辯護；但周恩來卻承認自己在軍事指揮

上的錯誤，他同劉伯承也都支持毛澤東的意

見。最後經張聞天折衝調解，在會議結束時

作成決議：「檢討博古（秦邦憲）、周恩來

、李德同志軍事路線的錯誤。」同時改組中

共中央和軍委會，包括（1）免除秦邦憲的中共

中央總書記職務，改由張聞天繼任；（2）撤除

周恩來中央軍委會主席職務，改由毛澤東接

任……等九項決定，另派陳雲赴俄向共產國

際報告此項會議決定改組中共中央情形，請

求批准。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出任軍委會主席

，但本身不懂軍事，除決定大的戰略原則及

軍事方針外，仍不能不借重周恩來，因之，

仍任周恩來為軍委會副主席，繼續指揮軍事

，並任劉伯承為紅軍總參謀長，協同指揮作

戰。

同年（一九三五）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

廿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全世界

代表大會，中共駐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王明（

陳紹禹）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了「論反帝

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其中特別強調中共

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並提出「組織

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國防

政府的基本任務是「抗日救國」。王明當時

因為了解中共軍正被國軍追剿，一時無法確

實聯絡，乃以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

」名義，在莫斯科發表「八一宣言」，其中

強調「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軍事行

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紅軍不

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與之親密

攜手，共同救國。」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十日共

產國際派彼得·佛拉第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到延安擔任「共產國際」的聯

絡官，駐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部

，並兼任塔斯社軍事特派員。他在啓程前夕

所得到的指示是：中國共產黨應遵照共產國

際決定，與國民黨採取聯合行動，建立一個

攜手不同心

忠不義而又過之。」

從上面的資料與事實中，可歸納為下面兩點：

(1) 中共對俄共採取「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手段。（註：毛澤東語）

(2) 俄共認為中央軍和政府積極的進行抗日戰爭，有利於疏解蘇、德戰爭時期的東面防線；而中共則認為國軍和日軍作戰正是八路軍發展壯大本身力量的良好時機，它不僅不協同國軍作戰，而且可以乘國軍之危，圖共軍之利。

國共聯合救亡圖存

對日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與中共再一度合作，係由於下列三種因素所促成：

第一，中共軍被國軍追剿，逼退至陝北地區僅餘殘部二千餘人，依賴當地土共支持，但因中共有共產國際的背景，不易全部消滅，而中華民國又面臨日本軍閥侵略，盧溝橋「七七事變」發生後，國軍全面抗戰已迫在眉睫，蔣委員長在戰略上必須避免「兩面作戰」。

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內戰，與國民黨採取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勢力，保衛中國的領土完整與獨立」。

第三，中共當時因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所以採取「卑辭求和」的姿態，以求達「哀兵必勝」的目的，除於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八月發表所謂「八一宣言」，強調「停止內戰集中國力，共同抗日救國」；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五月五日又由毛澤東與朱德共同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電外，並透過港粵地區地下活動管道，先與「國府西南運輸處」主任曾養甫接觸，由曾代向國府「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局長陳立夫表示關於中共輸誠之意願；經陳立夫轉報蔣委員長，當奉指派陳立夫擔任此項政治任務。

隨即由中共代表周恩來，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到上海與國府方面之張沖初步協商結果，決由潘漢年到南京與陳立夫正式談判。當時政府對中共提出下列四項條件：

- (1) 遵奉三民主義。
- (2) 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 (3) 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 (4) 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為地方政府，經雙方洽談結果，已獲致協議，正等待蔣委員長核定。

不料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旋因張學良悔悟，護送蔣委員長回京，同月十四日莫斯科共產國際亦指示中共執行和平解決的方針。

心同不手攜

「抗日聯合陣線」。但他在延安時始終受到中共「情報局」局長康生屬下工作人員的監視，不能隨意行動。只有蘇俄早在延安所設電台服務員尤辛告訴他說：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蘇俄司令部通知中國共產黨：日本從本土把一批完整的陸軍部隊運到中國大陸，集中在蘇俄邊界一帶。蘇俄司令部要中共八路軍給以幫忙，設法切斷通往北平、張家口、包頭的鐵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隊的集結點，但中共未予同意。隨著蘇俄在蘇、德前線的俄軍情況更加惡化，俄方希望中共部隊能對日軍採取積極的行動，但事實卻和俄方的願望相反。據佛拉第米洛夫的描述是：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部隊早已放棄了對侵略者採取積極的和消極的行動，中共部隊並不實施抵抗，他們逃到山區或是渡過黃河。」

「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為主要敵人，不遺餘力的來奪佔中央軍控制下的土地。」

「中共領導階層把戰爭看做是一個建立自己基地的良好機會」；「如果日本擊敗國軍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破壞，八路軍便立即滲入到那個地區，幹掉正在抗日陣線中的袍澤戰友來奪取政權。」

「毛澤東在來犯的敵軍之前，退卻後撤，使中央軍與日軍的衝突，成為對他有利益的事。在這國難當頭，全國人民含辛茹苦作重大犧牲的時候，這樣的一種手段，可說是不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九月廿二日中共正式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提出四項諾言：

- (1) 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 (2) 取消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
- (3) 取消「蘇維埃政府」。
- (4) 改編「紅軍」為國軍，歸軍委會統轄。

同月廿三日蔣委員長亦發表談話：「盼中共真誠一致，為禦侮救亡而努力。」

另據有關情報，中共內部對此事仍多不同意見，甚至認為向國民黨投降；中共中央乃在黨內黨外進行廣泛的解釋與說服工作。並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其中強調「對國民黨的讓步與妥協……正是為了取得本黨（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公開活動的機會，千百倍的去擴大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以增強本黨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又據中共重要幹部張浩（林毓英）在「抗大」授課時講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義」指出「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是我們的策略口號」，「聯合各黨派才能孤立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才能得到休息、整理、補充及擴大」；「我們要用抗日救亡的號召來分化，削弱和消滅反革命勢力。」

敵友之間臨深履薄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國民政府遷移重慶開始辦公，並定重慶為陪都。

次年（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正式成立，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秘書長為張厲生，我被派為部長辦公室隨從秘書。當時各辦公室都連在一起，右邊一大間為陳部長辦公室，中間一間為秘書長辦公室，左邊第一間為黃副部長辦公室，第二間為周副部長辦公室，我在秘書長辦公室內辦公，隨時穿梭進出辦公室，傳遞公文。

周恩來第一次到辦公室，是下午一時左右，正值上午辦公時間已過，剛巧我擔任值日，周穿著一身灰棉布列寧裝，身繫腰帶，後面跟著同樣服裝的勤務兵。進門時警衛室士兵不許他進入；一面向我報告：有一位自稱副部長的人是否屬實。我猜想一定是周恩來，即刻延請他到預定的副部長辦公室了解情況。

第二天周恩來就穿著全身金黃色中將軍裝，佩帶兩顆星的領章和肩章（隨行的勤務兵也穿著整齊的軍裝），昂視闊步的進入自己的辦公室。他為表示禮貌，首先到陳部長辦公室和多年來在戰場上刀鎗相對的陳部長握手言歡。他看見陳部長辦公桌上有一部「剿匪文獻彙編」（共四冊）內容除前頁說明和序言外，都是中共在江西時期「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內部的原始文件。周當時要求陳部長贈送他一部；陳部長回答說：這部書內有許多罵共產黨的文字。周很謙遜的

說：「不妨，不妨，批評我們也是有益處的。」

政治部照例每週要奉行「總理紀念週」有一次輪到周擔任主席，在背誦「總理遺囑」時唸不下去，周當時非常尷尬，但下一次他作主席時卻將「總理遺囑」背誦得非常流利準確。我常聽人說：共產黨是擅長偽裝的，從上面的瑣事作例證，使我才真正體會到

周恩來常到張厲生秘書長辦公室來談天敘舊，原來他們兩人都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同學，有一次張秘書長和周恩來閒談，張秘書長很幽默的說：「你在南開時多次演話劇，我真佩服你，扮演什麼角色就活像什麼，當時就真哭，當笑時就笑得很高興。我們離開南開中學後，你到了法國，我也進入了巴黎大學，當時有許多同學來同我談到俄國革命和馬克斯主義的問題，但我卻堅決反對共產主義，這也許是我的個性和志向不同，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恩來兄，你一生為共產黨工作，請問你們黨內究竟有那些人才？」周答說：「譬如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彭德懷、陳紹禹、劉少奇等都是很能幹的重要幹部。」張秘書長接著說：「你說這些人我都不認識，但我聽到許多人說：有一個安徽籍的共黨幹部，是一個小流氓。」周恩來知道是指的陳紹禹，當時臉色由紅轉青，不發一語，彼此杆格的情形可想而知。

在國民黨方面，當年陳誠和張厲生兩位領導人物，正代表青壯一代「有為有守」的革命黨人氣質，相關人物如陳立夫、陳果夫、張群、及陳布雷等莫不如此；但面對陰險狡詐為目的不擇手段的中共一班人，「誠有水火不相容」之感。

中共提出所謂「國共兩黨長期合作」，不過企圖將國家命運作爲它們「又聯合、又鬥爭」的犧牲品，能不令人浩嘆？

軍委會政治部的另一個副部長黃琪翔，是一個身材魁偉，儀表堂堂的標準軍人，他在政治部內平時保持著「中間派」的姿態、語言合宜、簡捷。他的辦公室內有一秘書，名周範文，他每天爲黃副部長剪報呈閱，我當時在隔壁上班，因常有往來，我發現他所剪的報刊，多爲傅布左傾思想的「生活雜誌」與有關「民主同盟」的宣傳文章等。

我的任務是傳遞公文，事先張秘書長吩咐：如有涉及反對共產黨的公文，不可送給周恩來，但可送給黃副部長。不料有一次黃副部長竟將此類的性質的公文轉送給周恩來，當時周在公文上批一長篇抗議的文字，大意是：如果要排除共黨，請自本人開始。此事發生後，陳部長了解黃琪翔並非真正的「中間派」，乃當機立斷，辭退黃副部長，改任張厲生爲副部長，仍兼秘書長。

談到這裏，我們應進一步了解黃琪翔的歷史背景。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國民黨發生「寧漢分裂」事件，黃琪翔和張發

奎當時擁有龐大的陸軍部隊，並與共黨有秘密聯繫。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八月一日中共發動「南昌暴動」，張發奎、黃琪翔二人實際雖未參加，但仍被共黨列入「國民革命委員會」主席團名單之內。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與黃琪翔以「護黨運動」名義，發動「廣州政變」，攻擊駐防廣州的李濟部、黃紹竑部隊，在廣東的西江發生了「粵桂戰爭」。這時廣州情況非常混亂，共黨乘機發動「廣州暴動」。

以上這些史實，足以證明他們和共黨有很深的淵源，而當年對國民黨造成的損害也難以估計。

文宣較勁高下立判

郭沫若係四川樂山人，在日本留學時期，原習醫學，但因愛好文藝寫作，稍後即成爲左翼文藝作家的要角，俄共史達林當權時，他曾公開發表詩文，歌頌「史達林爺爺」，爲毛澤東所不滿。中共退據延安時，設有「魯迅藝術學校」，但未延攬郭沫若，可見毛澤東對魯迅較爲倚重。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國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發表郭沫若任第二廳廳長，郭從日本動身回國曾作詩一首，其中有「登舟三宿見旌旗」之句，以表示對祖國之懷念。

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內部組織，分爲三個廳：第一廳掌管政治幹部之派遣與調動；第二廳掌管訓練與後勤供應；第三廳掌管宣

傳工作。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時，廳內人事幹部係以過去郭所倡組之「創造社」文藝作家爲班底。第三廳主任秘書爲陽翰笙，下設五、六、七三處，第五處主管動員工作，處長爲胡愈之；第六處主管藝術宣傳，處長爲田漢；第七處主管對敵宣傳，處長由副廳長范壽康兼任。各處下分三科，科長人事包括洪深、杜國庠、馮乃超等。

第三廳有關的文藝作家，多長於戲劇的寫作和演出；歌曲的編撰和歌唱，例如當時很流行的「流亡曲」、「松花江上」、「月光曲」，和「義勇軍進行曲」（註：此曲後來被中共定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以及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等等，一般青年學生和逃亡後方的難民當時的確很受感動，甚至熱血沸騰，參加支援抗敵救亡的戰鬥。不過後人把當年抗戰全民精神動員都歸功於這一批左傾文人並不正確；因爲同一時期中國國民黨也聯絡了不少的文藝作家推進抗戰時期的文藝政策，與三民主義的思想相結合，例如梁實秋、陳銓、易君左、王平陵、趙友培，以及主持文運會的張道藩等，會共同討論，發表長達二萬餘字的「文藝政策」，從而創造民族文藝，戰鬥文藝，喚起社會大眾，共同支援抗戰救國工作。

更重要的是後來蔣中正主席一號召十萬知識青年從軍的偉大行動：「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角聲響徹雲霄，因之，很快就編練成「青年，遠征軍」，實

際參加了滇緬邊區的抗日戰鬥。這些史實和績效，豈是郭沫若等的宣傳工作所能相提並論。

合作關係轉為破裂

(1)八年「明合暗鬥」——從民國廿六年八月至卅四年八月政府和國軍集中全力進行抗日戰爭；中共則避免和日軍衝突，只顧擴大本身的武裝力量（包括蘇俄將收繳日軍百餘萬人的武器全部支持中共）。中共的策略正如毛澤東對八路軍所講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付國民黨）；一分抗日。」

(2)兩年「打打談談」——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美國馬歇爾將軍——對國共雙方軍事衝突，進行十二次奔走調處，均無結果，實因毛澤東早在抗戰初期（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即決定對政府和國軍的鬥爭策略為「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是有理、有利、有節……：蔭蔽精幹，長期潛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3)九天的決定性「徐蚌會戰」——民國卅七年十一月間，中共事先運用「民主同盟」名義發動「反內戰」、「反征兵」、「反征糧」、「搶米」、「搶糧」等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使國軍早陷於孤立的困境，然後以其養精蓄銳多年的八十萬部隊投入「徐蚌會戰」，因之，國軍在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八日至卅日關鍵性的「徐蚌會戰」中失敗，此後即成為整個大陸迅速淪陷的主因。

百戰遺恨天留寶島

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經過了八年的浴血抗戰，並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同盟國的軍事行動，終於反攻勝利，使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中國並在聯合國中成為五強之一，全國同胞正在歡欣鼓舞的時候，不幸遭受蘇俄支持下的中共軍竊據了整個大陸，誠令我們萬分悲憤！

民國卅八年代總統李宗仁托病赴港，不理政務，行政院遷移台北辦公。

民國卅九年三月一日蔣總統中正復行視事，提名陳誠任行政院長。其後廿餘年，在臺灣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終於創造了絕處重生，光輝燦爛的台灣奇蹟：

在政務方面施行台灣省地方自治，省議會議員及縣市長均由民選；耕地「三七五」減租；都市平均地權；實施勞工保險，以及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委員會等。

在軍務方面，實施「戰士授田」，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增強金門、馬祖防禦措施；並從空中、海上及大陸內部策進大陸反共革命運動等。

在黨務方面，實施「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明定「中國國民黨」為「革命民主政黨」，實行黨員重新登記等。

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蔣總統中正

逝世，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並由蔣經國繼續擔任行政院長。

蔣經國對於台灣建設之發展關係甚鉅，除早期會同工程負責人林則彬開闢台灣橫貫公路外，在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底出任行政院長時即提出五年內完成九大建設計畫（台灣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新港、石油化學工業、大鋼鐵廠、大造船廠、台灣北迴鐵路、蘇澳港、桃園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逐年督導完成，奠定了台灣經濟奇蹟之基礎。

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蔣經國出任第六任總統，正值美國對中華民國斷交廢約之際，他處變不驚，堅持原則，除繼續擴充軍力，確保台海安全外，並全力加速經濟建設，促進「台灣現代化」；深入基層民眾，促成族群融和，他宣稱：「自己是台灣人」。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蔣經國連任第七任總統，雖身體健康情況日益惡化，但仍力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包括廢止實行多年的「戒嚴法」，取消「黨禁」，開放人民組黨結社的自由；解除「報禁」，落實新聞言論自由；並宣布「大陸探親辦法」，建立兩岸同胞自由往來的管道。

今天台灣已確實做到蔣經國對台灣「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的理想。不可能墜入中共政權所謂「一國兩制」的騙局，相反的，我們更希望進一步的促成全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